

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城镇化思想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条城  
镇化道路

姓名：柴乐毅

学号：2022000381

---

#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城镇化思想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条城镇化道路

柴乐毅 2022000381 政治经济学

**摘要：**本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文本，梳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城镇化的论述，从中抽出两个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不断发展的（手）工业产业和与之相应的不断复杂的市场需求。并且指出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建立过程中发生着严重的城乡对立和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同时将上述理论应用于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发现我国之所以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后能够迅速推动城镇化，同时没有发生诸如贫民窟等严重“城市病”，在于我国合理调节了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发展阶段与发展关系，避免了严重的城乡对立问题。

**关键字：**《德意志意识形态》，城镇化，大城市论，小城镇论

## 引言

本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文本，梳理马恩关于城市化的论述，并且总结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两个关键要素，即聚集在城镇且有不断发展趋势的产业以及被相应城镇产业所主导的庞大市场。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尝试将所归纳的城镇化视角应用于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具体而言，本文将产业生产的特征和与之相应的市场特征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回溯考察我国曾出现的“大城市化”与“小城镇化”两条城镇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与合理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成体系地专门论述城镇化问题，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城市化思想的研究并不多，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sup>1</sup>，而已有的研究更多注重于城乡关系。如曹钢<sup>2</sup>主要论述了城乡关系的过去与未来，以及城乡融合的途径在于改造农业和转变农民。龚唯平<sup>3</sup>考察了西欧城市化的进程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隋筱童<sup>4</sup>论述了马恩城乡关系思想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来源，并且重点论述了城乡融合的前提与路径。牛俊伟<sup>5</sup>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论述对象，从城市的起源、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关系、城市与两大阶级的关系以及城乡对立的终结四个方面讨论了马恩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上述研究虽然严格根据马恩经典文本展开，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研究与梳理工作，但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在中国政府计划与指导下开始的，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穷二白的状态迅速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马恩关于城镇化的论述很难直接应用于分析这一进程，因此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足点，从马恩关于城镇化的历史论述中抽取出推动城镇化的产业特征和与之相应的市场需求因素，并

<sup>1</sup> 屈婷著，《何以成城——马克思的城乡分工理论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2017年1月，3。

<sup>2</sup> 曹钢;曹大勇;何磊;，《论马克思的城市发展思想与国际城镇化百年革命——兼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创新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 01 vo 42 (2013 年): 5-17。

<sup>3</sup> 龚唯平，《马克思城市化理论探微》，经济前沿，期 7 (2001 年): 32-35。

<sup>4</sup> 隋筱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研究及新时代启示》，兰州学刊，期 10 (2020 年): 103-17。

<sup>5</sup> 牛俊伟;，《〈德意志意识形态〉城市思想探微》，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 03 vo 17 (2011 年): 52-57。

将其应用到对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的分析中。

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我国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化进程也迅速开展起来。一方面,改革首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在农村展开,进而在农村周边形成了一批乡镇企业,从而在乡村周围自发形成了一批小城镇,邓小平曾高度评价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搞商品经济”,中央也因此以“小城镇,大战略”的形式从政策上承认了这一过程<sup>6</sup>。另一方面,与对外开放相配套的城镇化政策在东部沿海地区规划了一批经济特区,这批经济特区接纳亚洲四小龙转移的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指引下积极引进国外投资与民营经济,这些地区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与小城镇相对比形成了大规模城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学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关于城市化道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城市化道路的讨论可以归为“大城市”与“小城镇”两类。

支持“小城镇”优先发展的学者认为发展小城镇更加符合我国国情,能够有效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sup>7</sup>。费孝通<sup>8</sup>认为应该小城镇,因为相比而言小城镇与农村相距较近,文化相似,能够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罗淳<sup>9</sup>通过空间转移与产业转移的区分分辨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区别,进而指出“农村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交融的平台或基本点”,应该将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现代化。在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方面,李世泰<sup>10</sup>从利益动力、产业动力、制度动力、农民排斥力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潘海生<sup>11</sup>认为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情况决定城镇化的进路,东南沿海大城市应该起到“接纳国际先进科技、信息技术、高端人才、金融等桥头堡和洼地作用”,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而其他地区应就地城镇化或者发展县级、地级城市以起到吸纳农村人口的作用。

支持“大城市”发展的学者认为应该尊重城市化规律,利用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来推动我国工业与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李迎生<sup>12</sup>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与先进技术,这些小城镇并不能提供,在我国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应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大城市。饶会林<sup>13</sup>从规模效益论证了应该放松对城市规模的限制。张正河<sup>14</sup>认为大城市顺应市场化改革,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王小鲁<sup>15</sup>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出发,认为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强的科技进步力量,因此大城市对我国来说极为重要,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刘永亮<sup>16</sup>论证了城市规模越大就越具有规模效应。

我国城镇化的现状从事实上论证了大城市对小城镇的阶段性胜利。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小城镇发展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无足轻重。相反,本文试图论证小城镇的发展一直是我国城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马恩关于城镇化的经典论述中归纳出城市发展的特点、要素与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城市作为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对象化,与产业的特征、需求的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的作用密切相关,再结合我国城镇化进程,力图说明两个观点:第

<sup>6</sup> 温铁军和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期7(2007年):23-29.

<sup>7</sup> 罗宏翔,《小城镇是目前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的最大吸纳者》,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2(2001年):66-69.

<sup>8</sup> 费孝通,《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瞭望周刊,期32(1984年):8-10.

<sup>9</sup> 罗淳和罗玲,《以小城镇发展深化新农村建设之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期03(2011年):92-96, <https://doi.org/10.13727/j.cnki.53-1191/c.2011.03.027>; 罗淳,《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人口研究37,期05(2013年):3-15.

<sup>10</sup> 李世泰和孙峰华,《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经济地理,期05(2006年):815-18.

<sup>11</sup> 潘海生,《关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中国发展观察,期8(2013年):16-18.

<sup>12</sup> 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期2(1988年):36-44, <https://doi.org/10.19934/j.cnki.shxyj.1988.02.006>.

<sup>13</sup> 饶会林,《城市经济效益分析》,财经问题研究,期1(1985年):49-55.

<sup>14</sup> 张正河和谭向勇,《小城镇难当城市化主角》,中国软科学,期8(1998年):14-19.

<sup>15</sup>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45,期10(2010年):20-32.

<sup>16</sup> 刘永亮,《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的动态分析》,经济学动态,期7(2009年):69-73.

第一小城镇的适当发展有效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初等生活需求,从而为我国培养更高水平的需求奠定了基础,使得大城市发展能够顺利进行;第二,镇的适当发展避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城市发展之初就大规模涌向城市,从而避免了稀释城市资本与贫民窟等城市病问题。

##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城镇化论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城市化的论述定位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阐述的资本主义史前史,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总体中来阐述城市化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称为《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明确阐述城市化问题的著作,同时《形态》也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在这里城市化的主线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交往关系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空间载体——城市与乡村也随之发生变革,即是说城市化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与发展的空间体现。而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下称为《手稿》)时,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论战与社会实践,马克思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知,亟待解决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系统性的理解,理解其起源、特征与限度;同时,当时马克思所见的是英国以纺织业为核心的大工业生产体系将全世界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市场中,因此在《手稿》中城市化问题被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进行定位:从历时性方面看,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行过程,如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催生出由追求剩余价值组织的资本生产以及相应的思维抽象,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概念;从共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世界一极建立起来后,其又如何影响其他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在《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城市化问题的论述支点,后者体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而在《手稿》中,城市化的论述则服务于资本生成与运动的理论体系。而《手稿》中的资本理论在深处又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这两处城市化的论述理论上可以组织起来,形成一套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本文主要处理《形态》中的城镇化论述。

###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城镇化论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分工视作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的进一步发展。”<sup>17</sup>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分工会相应地造成该社会形态发生不同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分工在空间上的对象化,社会因生产力-分工的发展导致的分工被体现在空间上,便是城市的兴起以及城乡关系的变化,这种空间上的变换反过来又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大体而言,这种关系是按照以下顺序发生的:“城市和农村的分离(手工业的自立)”→“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形成)”→“城市之间的分工(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分离(农村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大工业(世界规模的交往的实现)”<sup>18</sup>。在这一顺序中,每一个新的生产-交往关系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都从旧的生产组织中分离出来,以新的地区、形式为新的生产力开辟生长空间,最终由大工业将这些不断细分吸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世界市场。大工业将极度细分的分工从而也是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吸收在自身的生产范围中,按照资本逻辑组织生产,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下为对这一过程的论述。

<sup>1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24.

<sup>18</sup> (日)望月清司著;韩立新译,《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2009年10月,188.

从现实的生产出发，马恩说明了生产与交往之间的前提与决定关系，“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sup>19</sup>生产力的发展最明显地体现为分工的发展程度，而交往又建立在生产、分工之上，成为生产的条件。生产力在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导致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sup>20</sup>这种顺序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扬弃，分离出工商业劳动后形成的二元生产形式首先其生产总体的组织逻辑发生变化，原来在生产内部便可以满足的基本生活需求现在需要通过分工造成的交换来满足。这种原始生产的分裂必然要体现在空间上，即古代城市的出现。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产品的增加，从而市场也随之扩大，商业劳动此时便在市场所在地——城市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商业劳动要求进一步的发展，便不可避免地深入生产部门，其结果便为生产被商业所控制、主导，由此形成了生产力-分工发展的第二次扬弃。商业的分离体现在城市化问题上面，便是城市间的交往，这种交往使得不同城市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工业，从而原始分工形成的“地域局限性开始消失”<sup>21</sup>。

### 三种所有制：商业资本以前的城市

在这种逻辑下，马恩指明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以分工发展的顺序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对应着原始未分化的生产）、“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对应工商业劳动的分离）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其为商业劳动发挥控制作用提供了条件）。

部落所有制，在《手稿》中又称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其中分工还很不发达，“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的”，这些活动中的分工只是家庭中的自然分工的扩大，因此这是一种自足的社会单位，还没有分裂出农村与城市这样的二元格局。换句话说，此时城市与农村的概念还没有产生出来。如手稿中所述，“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sup>22</sup>因此，交往还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各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个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个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sup>23</sup>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被所分配的份地体现，土地作为间接的财产经由“共同体之父”所赐予，个人的独立性很低，如同附属于土地的奴隶般存在，此时土地的剩余劳动经由“共同体之父”的观念支配被共同体占有，多被用于耗费性活动，极少有增加于扩大生产的情况。

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sup>24</sup>，此时分工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城乡分离进而城乡对立也建立了起来，这种对立体现为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与代表农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因此也就有了共同体间的交往。<sup>25</sup>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因此共同体间的交往形式更多以战争和掠夺的形式存在。同时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一致对外的军事行为。在这种古代公社所有制（《手稿》中也称为古典古代式，典型为罗马形式）中，公社土地被分割，经过国家的中介而为个人所有，土地被个别耕作，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个人需要履行抵御外敌，保护国家的义务，从而保护以国家所有为中介的

---

<sup>19</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4.

<sup>2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5.

<sup>2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0.

<sup>2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1857-1858, 1995, 473.

<sup>2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1857-1858, 468.

<sup>2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5.

<sup>2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

私人占有土地。因此，个人的剩余劳动仍然被共同体所占有。在这种所有制中，分工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具有自然必然性。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发展成为经济、生产方面的联系，因此这种交往也很容易被消灭。（工业特性：自然属性，奴隶制之上，剩余：用来保护国家，交往：政治联系）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现实对应为罗马帝国衰落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封建制度，在《手稿》中被称为日耳曼形态。它是罗马帝国被北方日耳曼民族入侵后，日耳曼民族的军事制度被在罗马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影响而形成的<sup>26</sup>。这种所有制形式中也有家族单位与公社制度，但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与古代公社所有制不同，独立的家族被广袤的森林分开，独立进行耕种与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有在战争、政治活动与宗教活动等情况下召开时，公社集会才作为家族间的交往联系形式而发挥作用。在罗马式形态中，作为生产单位的家族以公社为中介获得土地，其为己的劳动需要以保卫公社为中介才被允许，剩余劳动被投入到军事行为中；而在日耳曼形态中，劳动首先是直接为己而存在，在家族生产单位独立生产的基础之上，公社才作为间接的形式而存在，偶尔的公社集会对一部分剩余劳动提出要求，而更多的剩余劳动则是被对象化到属己的生产过程中<sup>27</sup>（虽然这些剩余劳动更多的被用于个人消费）。这种所有制形式经过发展在城市和乡村间产生了对立，多种原因形成的行会制接纳不断从乡村逃离来的农奴，使他们成为帮工或城市无组织的平民。行会中的帮工与师傅之间的关系模仿着乡村农奴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为了维护城市稳定、保护行会的利益，制定了一系列防止竞争的制度<sup>28</sup>。

三种所有制形似中有两种出现了城市，这两种城市都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都是工商业的聚集地，都与农业有着外在的关系。然而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前的城市，各自内部也有着极大的差别。古典古代式城市的生产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之上，其分工仅仅是家庭分工的扩大，家族生产也是以保护国家的军事行动为中介才被允许，剩余劳动因此也在名义上与实质上属于国家；在日耳曼形态所有制中，尽管分工也只是初步发展，但自然分工的必然性却被流动的农奴、行会制对血亲以外劳动力的吸收等等所松动。更为重要的是个体不再经由公社中介，而是直接为自己与家族劳动。不仅如此，直接生产者也由奴隶转化为农奴与帮工，人身依附的减轻使得人口流动更加容易。更为重要的是在中世纪城市中货币关系已经发展，使得商业从工业中分离得以发生。

## 商业资本的作用与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

商业发挥作用在《形态》中被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建立工场手工业从而战胜等级资本的过程，大致发生在13世纪-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买商制度发挥作用，第二阶段则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形成新兴工场手工业城市。第二个时期为机器大生产时期，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

第一阶段为马恩在《形态》详细考察中世纪欧洲城市，中世纪欧洲城市随着手工业劳动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在欧洲封建制下，首先是“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作为中世纪起点的乡村。在这里建立起了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庄园制经济关系<sup>29</sup>，而城市作为逃亡农奴的聚集地，有着与农村“封建土地占有结构相同的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sup>30</sup>在城市中

---

<sup>2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83.

<sup>27</sup> 王青;李萍;李海春编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2011年1月，230.

<sup>28</sup> 谢富胜著，《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2005年4月，141.

<sup>29</sup> 牛俊伟，《〈德意志意识形态〉城市思想探微》.

<sup>3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8.

形成的是自然资本：“住房、手动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sup>31</sup>的等级资本。但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便作为交往与生产分离。商业首先只是沟通不同城市的生产，使得不同城市形成各自的优势工业部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人与高利贷者第一次获取到了作为累积货币的剩余劳动，并且利用包买商制度来渗入生产。商人对手工业产品的购买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需求，而生产以纺织品为代表性产品的手工业劳动因为“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艺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特征而被行会排斥。因此商业交往便在农村渗入到了农奴与自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中去，这种剩余劳动原本是作为农业的副业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进行简单交换，但商人在包买商制度下逐渐控制了这种副业，并且将之转化为有组织的工场手工业。以织布业为代表的工场手工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sup>32</sup>由此，由商业交往推动的第三种城市便产生了，它可以视为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这种生产方式上的转变有着这些结果。第一，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在行会中仍然存在着师傅与帮工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乡村与小城市，工人与雇主的关系虽然由金钱所组织，但仍具有宗法色彩；然而在新兴工厂手工业城市，宗法色彩便完全消失，金钱关系完全占主导。第二，作为分工进一步发展产物的工场手工业有着更高的生产力，同时商人的行为已经以盈利为目的，这种盈利在竞争的条件下势必会导致一部分收入投入到再生产中，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因此自然资本与商业资本相比便衰落了下去。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sup>33</sup>，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工业与商业集中于一个国家，工业的典型特点为脆弱与依赖商业，“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sup>34</sup>因此各个国家为了瓜分与稳固市场，对脆弱的工业采取保护措施，而商业却有着强大的面孔，商业的收缩与扩张决定着工业的膨胀与凋零。因此，“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商业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占统治。”<sup>35</sup>但工业与商业集中到同一个国家（英国）的现象为其创造了广袤的世界市场，因此也创造了庞大的需求，这种需求与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了利用自然力进行生产的大工业。“它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sup>36</sup>它建立了第四种城市：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在这种城市中，由工业资本而非商业资本规定着生产的节律，决定着剩余劳动的量与去向，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在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中被建立起来了。

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最先在英国建立起来。工业与商业集中在英国，为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和与之配套的过量需求，而行会手工业的生产力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与更高生产力的需求首先被建立起来，而生产力本身还有待提高，这种提高是由对自然力的利用实现的。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商品生产，科技的发展与机器生产的建立最终使英国率先建成大工业与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兰开夏郡从英国的贫困地区一跃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工业-经济城市。大工业城市的产生使得城市彻底战胜了乡村，资本战胜了地产。事实上，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成过程本身就体现为城市战胜农村的过程。在行会城市以前，城市一直是农村的附属，要么作为农业生产的附属产业为农村提供手工业产品，要么作为农村农奴的避难地，结盟以对抗农村贵族的入侵。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它起源于

---

<sup>3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9.

<sup>3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2.

<sup>3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5.

<sup>3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6.

<sup>3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6.

<sup>3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8.

农村，商业资本难以控制行会手工业，便到农村控制农村副业。包买商制将农村手工业的地位从副业转化为主业，同时圈地运动也在政府的推动下加速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这两者使农民失去自己作为自耕农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消灭农村副业，使乡村转化为城市，农民转化为工人，为新兴生产力——城市工业造就了大量产业后备军，同时工业的建立也使得农村农业转化为城市工业的附属部门；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统一市场使得这些后备军与其他非农公民一起产生了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支撑着工业城市的建立，海外的需求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用自然力的机器大生产，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

## 城镇化的因素：需求的诱因与工业的发展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厂，以纺织业为核心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已经建成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从欠发达地区攫取劳动力与原料，在本地加工为工业制成品后作为商品向全球提供。从历史生成逻辑的角度对这一 19 世纪特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便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在西欧的现实体现即工业化与城市化。因此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说，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过程即发达的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对象化过程。生产力被体现为人们一定的空间之中组织起来，运用协作与自然力的力量来生产，而生产力的最明显表现为分工，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力表现的分工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体现出来，这种体现即城市的发展。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此时城乡分离尚未发生，人们只是被动地服从自然力进行生产，因此分工体现为自然分工，空间组织形式为能够自我满足的家庭或者家庭的简单扩大形式。然后是农业剩余的增加导致工业的产生，自给自足的经济由此被分裂为两个相互满足的单位，或者二元经济体，这种分裂在空间中外化更多是因为政治原因：农业作为固有的利益集团排挤、控制新兴的生产力，新兴生产力在这种对抗中逃离了乡村。第三，新兴生产力逐渐发展稳固的过程中，即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的工业不断侵犯农业与乡村并且最终控制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生产也以货币的形式运行，被资本逻辑组织。城镇化过程的特点如表 1 所示

从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过程的一个核心表现即城市战胜乡村，工业战胜农业，这一过程即新兴生产力不断尝试摆脱旧有生产关系的控制，获得独立生长空间的过程。中世纪之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奴隶、农奴和帮工摆脱人身依赖，获得自由的过程。而在此之后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可以从多种方面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首先，它是商业资本进一步发展为产业资本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国家扶持，设置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使产业资本由小变大占据支配地位。其次，这是一个个体需求的开发与积累的过程，从量上来说，大工业能够生产大量的产品，在以地方需要为目标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大工业持续稳定地进行生产；从质上说，大工业的巨量生产属性能够迅速满足已有的需求，为了维持不断的生产与发展，就需要不断开发新的需要，依靠新的需要来支持生产不断运行与发展。第三，从生产的条件来看，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雇佣工人，工业控制农业的过程的一部分即是为这一条件服务。这些不同的侧面被资本组织而发生，每一步都建立在对抗与斗争的历史之上。以英国为例，在建立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之前，英国经历了残酷的农业革命，即圈地运动和土地大私有化，强行剥夺英国农民的生产资料，为城市大工业的生产提供条件，这一过程充满着暴力和国家强制。为了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商品需要，英国也不断向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打开落后国家的国门进行商品倾销，同时也攫取当地廉价原材料，建立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这些过程不仅造成了本国国内大量农民破产，沦为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造成了产业工人的高致病率与高死亡率，赤裸裸的资本积累也使得破产农民与产业工人沦入赤贫，在城市形成大量贫民窟与孤儿院。



表 1

城镇化的特点

城市	个体与城市关系	城市工业组织形式	城市建立动力因素	与乡村的关系
古代公社城市	家族隶属于共同体、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个人生产	具有自然必然的手工业（自然分工）	简单分工（生产力的初步发展）、使用价值生产的场合	乡村的简单延伸
日耳曼式城市（行会手工业城市）	个体隶属于行会，行会直接为自己生产，必要时组织起来守卫城市	行会组织形式，具有强烈排外属性与人身依附性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逃亡农奴保护自身的结盟、使用价值生产的场合	与乡村结构类似，乡村控制、入侵农村；手工业是乡村的附属部门
商业发挥作用的第一阶段		农村手工业被商业组织、控制；农村手工业从小农生产向工场手工业发展	城市行会的排斥、农村拥有原材料与可利用的劳动力；农村手工业较为脆弱	处在农村
商业发挥作用的第二阶段（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	以获取工资、利润为目的直接进行生产活动	机器工业大生产模式	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需求、自然力的应用、商业资本推动、产业保护政策、劳动力与原料充足	农民转化为工人，农村副业转化为主业、农业成为城市的附属部门

生产力的发展客观要求在空间中被体现出来，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明显体现为分工，这就意味着分工的不同会在空间中体现为不同的现象，也即不同的城市类型。如果按照城市与农村的附属关系来划分的话，西欧历史中出现的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附属于农村的城市，古典公社城市、日耳曼式城市均属于这一类；另一类为支配农村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典型为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第一类城市作为乡村的附属，其规模受到地方需求的限制，其中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受传统生产方式（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实际上可以将之看作农村在城市的变形，或如马克思语“城市的农村化”；而第二类城市则没有这些限制，它更多受到资本与者现代化生产规模自身的限制和所供给的跨区域需求总体（比如全球市场）的限制。历史上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导致了行会手工业城市的衰落，这两类城市虽然有着并列存在的时段，但更多的是一种顺承关系。作为广义的城市战胜乡村，行会手工业城市因其内部严格的限制行规与生产的保守性，在与大城市工业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了。但这并非意味着行会手工业城市一无是处。第一，大城市工业是在商业交往与商业资本的运作下建立起来的，而商业交往则是从手工业城市中独立出来的，这意味着在手工业城市与大工业城市之间有着因果上的顺承关系；第二，手工业城市的发展也培育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在此需求作为支撑的条件之上商业资本才能在乡村组织生产并与手工业城市竞争。这两点即对应着城镇化推动者——工业，和孕育产业的需求。任由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对立与冲突，这在西欧城镇化进程中即体现为济贫院、福利院与孤儿院，以及大量失去生产资料却拥有悲惨命运的无产阶级，他们是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对立的结果。

#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大城市和小城镇与乡村的互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两条路径，一种是由乡镇企业推动的农村城市化，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化。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关于城市化也有一个核心问题：以大城市发展优先还是以小城镇发展优先。双方所持观点已在文献综述中论述。从历史上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创办而迅速发展。然而在我国经济起飞以及加入 WTO 后，东南沿海大城市依靠出口导向型产业迅速壮大，其规模，人口，城市建设，经济体量远非小城镇可以比拟。那么这一结果是否说明城镇化道路中最终大城市优先发展取得胜利？此处便以上述理论总结为工具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简要分析小城镇与乡村在当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我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发生如西欧那样大规模剥夺农民生产资料来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造成大量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如印度与拉丁美洲那样，造成大量城市贫民窟与严重城市病的同时农业崩溃，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根据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来规划指导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同时存在着乡村城镇化与大城市化两个过程，这两个进程相互促进，互为中介，为对方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避免了严重的城乡对立、由此对立所产生的城市对乡村的残酷政府，起到了加速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同时避免出现拉美等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等问题。

## 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着长期停滞、受限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作为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农业大国，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外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敌视。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局势之下，中国确定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军工生产能力与国防水平。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政府有计划地发展工业与刻意控制城市化进程，利用工农剪刀差从农业生产中获取剩余以支持城市工业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在较低程度上引起了一批城市的建设，我国城市数量从 1949 年的 135 个发展到 1961 年的 208 个。<sup>37</sup>随着城市数量的增长，城市人口也随之增加，但是重工业有重资本轻劳动的特点，无论是农业剩余还是城市工业都不足以支撑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集中经济剩余以发展工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以控制、缩减城市规模，包括户籍制度、统购统销、知识青年下乡等政策制度。这些措施共压缩城市人口 5600 万人，全国城市数量也有所减少，从 1961 年的 208 个减少到 1976 年的 171 个<sup>38</sup>。

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是我国迅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能够自卫的国防能力，保证我国能在相对安全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进行生产建设。但也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城市与乡村均被作为工具以发展工业，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节，为发展工业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后来成为长期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不利因素。以“工业以钢为

<sup>37</sup> 邓大松，黄清峰和孟颖颖，《反思与阐释：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探析》，理论月刊，期 1 (2014 年): 5-8, <https://doi.org/10.14180/j.cnki.1004-0544.2014.01.030>.

<sup>38</sup> 王雅莉和姜义颖，《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回顾与展望》，工业技术经济 38, 期 10 (2019 年): 14-22.

纲、农业以粮为纲”为特点的一系列国策使得工业发展在较长时间里难以反哺农业生产，从而停滞发展的农业也难以供给更多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工业发展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国防需要而非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国民经济体系事实上处在一种被计划强制力推动的割裂状态。因此当支撑这种工业的国防需求减弱，计划手段不再作为经济运行的唯一手段后，面向国防与赶超任务的工业体系就会失去支撑其的农业剩余基础与拉动其发展的动力，从而停滞不前。

## 1978—2001 年小城镇迅速发展阶段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冒着极大风险实施“包产到户”，开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有效组织并激励了农村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力显著被提高，潜藏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显现出来；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制度层面的确立也瓦解了人民公社制<sup>39</sup>，与之相配套的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等也逐步松动，这些制度层面的改变允许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不再从事生产队集体劳动、不再被限制在农村户籍所在地<sup>40</sup>。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全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实施，商品生产形式的建立以及相应的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的选择。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大体上有两个方向，第一，仍然留在当地及其周边地区，从单一粮食生产劳动转向多种经营，再到进入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当地推进了农村城镇化过程，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随着乡镇企业一道自发形成的，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可以成为小城镇化；第二，借助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流动到直接需求劳动力的沿海地区，这一过程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发生的，国家分别在 1980 年和 1984 年建立经济特区与对外开放城市，这些地区具有政策与地理位置双重优越性，因此更早引进外资、人才和技术，及时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一起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具有自上而下的色彩，成为大城市化。

在马恩的经典著作中，因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城市有两种，一种为行会手工业城市，另一种为现代化大工业城市。这两类城市在在时间上的出现有着很明显的先后关系，在历史逻辑上，或者在城市建立的动力上也有着明显的顺承关系。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城市是由从农村逃离的农奴与已有行会手工业生产组织相结合形成的，而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是由行会手工业城市所分裂的交往-商业资本在农村充分发展后形成的（兰开夏郡），其产业组织形式为机器大生产，对标的需求为世界市场的一大部分。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国小城镇化与大城市化均不符合马恩的城市化分析，这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共存，在产生的逻辑上也相互并列，并无直接的顺承关系。但若从生产体系与引致生产的需要这两方面来看，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逻辑则与马恩的城市化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释放。在农村，因国家不再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利用工农业剪刀差获取农业剩余不再成为发展城镇工业的重要工具，农产品购买价格提高，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工业的引进，农业产量进一步提高，农民通过多元化生产抑制了农业边际生产力降低的趋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至 1991 年的 709 元；城镇人均居民收入经过中央上调职工工资、财政包干制等影响，从 343 元增加到 1701 元。收入的增加有力地刺激了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为对基本生活用品的需要，包括对轻工业品、日用品、服装等缺乏

<sup>39</sup> 屈婷著，《何以成城——马克思的城乡分工理论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246。

<sup>40</sup> 蔡昉，《历史瞬间和特征化事实——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内涵》，国际经济评论，期 4（2018 年）：9-23+4。

技术进步的低档产品的需要<sup>41</sup>，而这些产品主要由乡镇企业生产。与行会手工业类似，这种需要是在已有或引入简单技术后产生的内生需求，同时其满足也大多可由本地乡镇企业初步满足，即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城镇化是一种本地现象。但行会手工业城市与中世纪乡村对立的性质在我国并未出现，其原因在于这种城镇化由“离土不离乡”的“自家人”推动，城镇化过程内部并没有显著的利益冲突现象。而“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也有力的避免了农民失去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现象，有效维护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总而言之，我国城镇化过程与行会手工业城市在经济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已有生产技术水平之上由民间自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政府引导（收入调整）形成的“数量型温饱需求”<sup>42</sup>引致出乡镇企业从而带动小城镇化过程。这一阶段以中国正式加入 WTO 为标志而结束。

## 2001-2012 年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培育、积累了新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以中国正式加入 WTO 为标志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为国际贸易，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央地财政关系，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政府作为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的同时也有着强烈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sup>43</sup>。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模式引导城市化进程，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行招商引资，在“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指引下引进外资与现金技术管理能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培养基于引进先进技术的新需求。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沿海大城市率先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承接自亚洲四小龙的中低端产业在这些地区迅速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不同，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有着一定的技术进步。这些产业对应的需求有两方面，一部分为“市场换技术”政策指导下在国内培育出来的对带有技术进步产品的需求，典型产品为各类家用电器；另一部分为接受以服装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这部分产业逐步由世界市场需求引致而发展，走上外向型工业化道路。有技术进步的工业品生产客观上要求集约型现代生产体系，这也与乡镇企业缺乏良好生产基础环境、生产要素受地域限制、生产较为分散等形成显著差异。

马恩的理论中，由行会手工业城市排斥的商业资本经过在农村的发育，最终成功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后者与前者在相同的市场竞争并最终战胜前者，同时也战胜乡村，使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沦为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失去土地与家乡，进入城市，忍受城市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然而在我国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中，两者所面对的市场有所不同，后者为因当地内生的对基础型、缺乏技术进步的基本使用价值的需求而发展，这种需求会因生产的发展而趋于饱和；而前者的市场由外资与民营企业培育而成，带有一定的技术进步属性，具有不断发展的需求，同时生产规模因面向全国与世界市场的部分需要而迅速扩大。因此大城市产业因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与聚集效应而不断发展，而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则因内在于生产的属性（粗放型无技术进步生产的发展导致的需求饱和）、农民工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工业化大城市转移而趋于衰落。小城镇的衰落与大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否定小城镇的作用。第一，小城镇的发展有效满足了改革开放后所释放的基础需求，从而为培养对有技术进步产品的需求铺平道路；第二，在大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当城市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承载足够多的农民工进城时，乡村城镇化有效地为城市化提供了缓冲地带，农民工可以选择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避免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城市，从而避免城市人均资本降低导致工业化的放缓甚至失败，形成如贫民窟等城市病。

<sup>41</sup> 谢富胜;匡晓璐,《转型增长的中国奇迹》,教学与研究,期第11期(2021年):30-42.

<sup>42</sup> 谢富胜;匡晓璐.

<sup>43</sup> 杨瑞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7,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115781/>.

## 2012 年至今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

中国经济于 2012 年步入新常态，GDP 增长率跌破 8%且逐年下降，以投资为导向，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增长动力机制逐渐显示出动力不足的问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城市化以速度、以量取胜的传统逻辑需要向高质量城市化发展逻辑转换。城市化过度依赖于大城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城镇化快于工业化，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大城市对小城镇的持续抽血与小城镇的持续萎缩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过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产业-城市一揽子政策更加注重投资，更加注重城市的规模与经济属性。大城市优越的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劳动报酬源源不断吸引乡镇地区人口流入。过度依赖大城市的发展政策导致一系列大城市病的同时，小城镇因年轻劳动力流失、失去投资机会等而呈现出功能性萎缩的现象。马恩在《形态》中分析行会手工业因排斥商业资本而导致的乡村城市化再次呈现出其理论前瞻性。大城市因劳动力成本提高与城市规模过大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产业向周边地带聚集。这种聚集是由城市析出回报率较低而成本过高的产业形成的。一方面，它推动了城市周边乡镇地带的城市化，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为先进生产力开辟空间：尽管是以倒转的形式开辟空间：为城市组织、形成以网络化、数字化为特点的先进生产力腾出空间与人力资源。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正式出台，这标志着我国城镇化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划提出要解决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问题和大城市病问题。规划提出要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这意味着为高质量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新一轮小城镇化已经到来，小城镇化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中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产业升级、保证城市服务设施机会公平化与深入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 结语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论述对象，以西欧城镇化进程为论述材料对生产力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建立进行了宏观的论述。本文根据《形态》对城镇化的论述，论证了发展中的（手）工业产业和与之相应的市场需求这两个要素主导着城镇化进程，指出在由资本引导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西欧城镇化进程发生着严重的城乡对立和城市对乡村的征服。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能够顺利而且迅速的发展，关键在于大城市与小城镇在适宜的阶段被引导协调发展，从而使不断复杂的工业产业与要求不断提高的市场续调产生良性互动而螺旋发展，同时也避免了城镇化进程中如印度和拉丁美洲严重的城市病。